

新时代助推舟山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基因研究

——基于普陀区的现实观察

□普陀区委党校 郑聪杰

村级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发展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振兴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渔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质量不仅关乎舟山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海洋经济强市”的发展定位,更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工作的开展。因此,高质量发展渔农村集体经济在新时代新阶段被寄予了使命性的价值。

一、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在各级政策、资金、要素支持帮扶下,普陀区农村集体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据 2022 年相关部门统计,2021 年,全区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 11.6%和 16.4%。但是如若对照村庄发展的现实需要,亦或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则经济体量明显过小。例如,2021 年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仅为 1.96 亿元,经营性收入仅为 1.63 亿元,同时 74 个行政村中尚存在 9 个省定、市定相对薄弱村。全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另外,还存在更为严峻的三个结构性问题。

一是村级集体经济总量上升,但分化严重。2021 年全区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实现正增长,但仍有 31 个行政村经营性收入为负增长。部分城中村、城郊村依托城市发展优势,早期通过发展酒店、门店、厂房等产业,积累了丰厚的集体资产,使得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较强。相对应的,位置偏远、资源匮乏、周边缺乏产业带动的村庄往往集体经济发展羸弱,导致集体经济先进村与薄弱村之间在整体总量和发展水平上差距悬殊,呈现强者愈强局面。

二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途径单一,内生动力不足。2021 年,全区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占 83.1%,构成村集体收入主体,但是其形式过于单一,要么通过盘活集体现有土地、农房、养殖塘等闲置资源,要么通过购置或兴建商铺、厂房用于出租,总体而言仍以

资产租赁为主导。然而对于前者而言,村庄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对租赁有着决定性影响,发展基础较差的村庄资源竞争力不强、盘活后的运营成本过高,潜在市场狭小;对于后者而言,受实体经济、房地产业不景气等影响,物业经济保值增值空间有限,租金上涨乏力,且存在空置风险。所以,村级集体经济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缺乏产业支撑、增长后劲乏力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三是村级财务收支倒挂、集体经济入不敷出现象突出。在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后,许多村在集体资产、资源被征收后,为了顾及村民意愿,将村级资金结余用于股权分红,而不是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导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渠道狭窄,增收后劲不足,缺少合资合营、引资联营、股份合作的经济实体。与此同时,村集体的事务性支出,尤其是老年人福利、环卫保洁等方面的费用却逐年递增,出现村级财务收支不平衡,甚至倒挂现象,近 1/3 的村级组织只能勉强维持运转,根本没有多余资金用于集体经济的发展,缺资金成为束缚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咽喉。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基因助推集体经济发展的历程

在新中国成立前,作为后来舟山专区主体部分的定海县属于浙江省内开发时间较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据 1947 年浙江省政府统计,定海县适宜种植水稻的土地面积仅 28 万亩,只能满足全县 43.9 万人口中三分之一的口粮。因此,水产品和海盐生产就成为主要经济来源。然而,当时舟山渔业生产仍然停留在百年前的发展阶段停滞不前,除浙江水产学校的两艘实习渔轮外,新式渔业几乎为零,不具备推动渔业现代化所需的工业基础。同时,1953 年成立的专区主要也是出于解放台湾的国防建设需要,所以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投资自然也比较少。

为了尽快摆脱传统经济的羁绊,加速渔业经济现代化的步伐,舟山地委各级政府鼓励和帮助个体经营的渔业生产者组织起来,以互助合作的方式恢复和发展生产。渔区人民怀着“增加生产增加收入,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过更幸福美满生活”的朴素愿景,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情,将“艰苦创业”的精神转化为向海图强的豪情,将“敢啃骨头”的精神转化为实干争先的拼劲,将“勇争一流”的精神转化为跨越发展的魄力,以自我积累推动舟山渔村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各级党政宣传部门顺势而为,将这种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劳动热情提炼为“蚂蚁岛精神”“南峰精神”“滩浒精神”“一滴油精神”等,并且通过政治宣传、劳动竞赛、参观学习等方式将这些红色基因在舟山推广开来,从而进一步发挥好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改造作用,加速了集体经济发展的步伐,有力地推动了渔区面貌的改善,特别是在渔农村公共和公益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

在传统社会,虽然修建大型的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征发劳役的形式完成,但是修建乡、村一级的地方设施则既超出小农家庭的能力范畴,并且又通常难以获得政府的支持,由此形成千百年来传统农村公共和公益事业发展不足的问题。而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新阶段,人民群众集体高涨的劳动热情和勇于挑战自我的拼搏气质促使各渔业队社在物质条件相当艰难的情况下,依靠集体积累资金和调动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大幅度提升渔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大幅度提高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主要依托村社内部力量将传统社会改造成为现代社会结构。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启示着经济发展与精神激励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可能。

三、以红色基因活化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下,在发展渔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孕育出一批以“艰苦创业、敢啃骨头、勇争一流”为特征的红色基因文化,它们不仅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形成之后,又深刻影响了社会存在的发展。面对当前舟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疲软的态势,通过挖掘和激活传统红色基因,进而助推农村集体经济质量提升发展,就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一是要活化红色基因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为意识。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乡村发展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在于村、乡集体组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政府和渔民群众都意识到舟山渔农村发展滞后的原因在于个体化的渔民无法形成团体效应,无法以集体的力量共同应对历史难题。因此,要想改变渔村衰败和凋敝的局面,就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将渔民组织起来,以此改变分散状态,这也构成了以“蚂蚁岛精神”为代表的诸多红色基因最为深层的内涵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渔业经济体制改革将原先的集体经营转变为个体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优点很明显,但劣势也很突出,具体表现为“人心散了”。因此,在当前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红色基因的活化必须与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建设相统一。任何文化的建设都不可能脱离物质实体的建设,反之亦然。因此,只有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强、把基层政权巩固好,才能为红色基因的重新挖掘和活化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使红色基因效用的发挥能有“集体”这个最重要的抓手。

二是要活化红色基因中“自我革命”的精神气魄。勇于自我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也是舟山红色基因对创业者、建设者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我们的认

识和实践刚刚起步,有的方面还没有破题,需要广泛探索。这就要求保持战略定力,应势而谋,深入研究管用的措施和办法,通过变革打通道路,释放经济发展潜力。这就要求我们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身察看、亲身体验,在实践中深化规律性认识,在调研中努力吃透情况、把准脉搏,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渔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做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三是要活化红色基因中“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英国著名学者珀西·罗克斯比就曾指出:“中国的成功取决于农民在多大程度上能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和前途与国家事业的紧密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农民是乡村社会建设的主力军,要想发动农民的力量,就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激发起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其自愿投身到农村事业之中,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农村的发展。因此,五六十年代“蚂蚁岛精神”“南峰精神”之所以能被树立为典型,其根本原因在于充分考虑到广大渔农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承受能力。正因此,在新形势下,红色基因的活化过程不仅要强调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创造热情这一面向,也要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深刻意识到“谋划发展,最了解实际情况的,是人民群众;推动改革,最大的依靠力量,也是人民群众”,从开辟渔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的历史伟业。

总之,时代演进,精神不变。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借助历史光环逃避现实问题,而是为了认清历史有其发展的规律和大势。因此,在新的背景下,重视红色基因就像明灯,指引前行,照亮未来,相信舟山渔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将循着建设现代海洋城市的目标劈波斩浪、挺进深蓝。



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公益广告

文明习惯风雨同 “舟”

垃圾分类责任如 “山”